

歷代駢文批評綜論

何祥榮

香港樹仁大學

引 言

駢文是中國古代文學中的獨特寫作形式，在中國古代文體發展史中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然而，在過去的中國文學批評研究中，對駢文的理論與批評注意相當不足，在多本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的專著中，均沒有半頁篇幅涉及駢文批評的研究。為進一步考察中國駢文批評的縱向發展，實有必要就其宏觀的流變，作出系統的整理。綜觀歷代駢文批評的流變，實可分為「孕育期」、「成型期」、「轉型期」、「沉寂期」、「成熟期」等不同階段。

一、孕育期——漢魏兩晉南北朝

中國的駢文史可追溯至先秦。其時文章包括經書、子書等均有儷偶之句，成為駢文的雛形。其偶句雖多率爾成對，但畢竟已開駢偶行文的風氣之先。但就駢文批評史而言，對於儷偶的評論，於先秦並不多見。中國駢文批評萌生於漢魏六朝是不爭的事實。其中，尤以《文心雕龍》的出現，帶出專論偶句運用的《麗辭》篇，便是專論駢偶的先聲。然而，與文學創作進入自覺時代不同，從漢魏兩晉到南北朝，駢文批評始終處於「非自覺」的年代，由於「駢文」這專有的寫作形式的名詞尚未確立，觀念仍屬模糊，導致與此種文體相關的評論更是模糊。如簡文帝的《與湘東王書》只以「今文」或「今體」指稱「駢文」，「駢四儷六」的觀念最快也要到唐代柳宗元時才建立，顯見，六朝時「駢文」作為文體寫作形式的觀念仍是未成系統的。文體未明，更遑論文體的批評。因此，漢魏六朝雖是文學創作自覺及駢文寫作繁盛的時期，但就駢文批評而言，仍處於尚未自覺的雛形階段。其次，即使有《文心雕龍》多篇涉及駢文修辭形態的專篇出現，但《文心雕龍》畢竟並非完全針對駢文而發，其中所論，如《麗辭》、《章句》、《練字》、《聲律》等也可應用於詩歌。劉勰大抵並未自覺地以寫作駢文批評為著書的主要目標，而是兼及詩、樂府、賦、騷等。基於以上種種原因，筆者把漢魏六朝稱之為駢文批評的「孕育期」。

此期既為「非自覺」的駢文批評時代，則此期的駢文批評只能是泛義的，即駢文的構成元素及與駢文修辭形態相關的文獻，均可錄入此期的廣義的批評範圍。張仁青《駢文學》把對偶、句法、聲律、辭藻、用典視為構成駢文的五個元素。其言曰：「四六文構成之要件有五：對偶精工，用典繁夥，辭藻華麗，聲律諧美，句法靈動。此五者缺一不可。」^[1]莫道才《駢文通論》則把對仗、聲韻、典事、藻飾視為駢文四種修辭形態。二人的用詞雖有不同，然其包含的駢文元素則一。漢魏六朝，隨著文學自覺時代的開展，文人對文學有了新的藝術追求，對於與駢文相關的審美形態，也有過不少論述。

漢魏兩晉，文人已不再滿足於樸質的風貌，即使是應用文體如書信之類，也追求藻飾華美。曹丕、曹植便是典型例子。曹丕不僅在《典論·論文》中勾劃了四種文體的審美要求，也在《敘繁欽》一文表達了他對華辭麗藻的喜好。繁欽在一封回信中雖然誇張失實，但曹丕不僅沒有怪責，反倒讚賞其文辭的華麗，故云：「欽箋還與余，盛嘆之。雖過其實，而其文甚麗。」^[2]曹植在《與吳季重書》中也表達了他對文采華美的好尚，「得來所訊，文采委曲，曄若春榮，瀏若清風，申詠反覆，曠若復面。」^[3]曹植對於吳質的回信，特為讚賞他的文采與內容充實之美。《爾雅·釋訓》云：「委曲（委佗），佳麗美麗之貌。」《文選》李善注：「曄，盛貌。」曹植讚美吳質來信，文采猶如春花一樣美盛。經過反覆誦讀，如見其人。又如卞蘭《贊太子賦並上賦表》：「竊見所作《典論》，及諸賦頌，逸句爛然，沉思泉涌，華藻雲浮。聽之忘味，奉讀無倦。」^[4]吳質《答東阿王書》：「質白，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喻之綢繆乎。」均以文采藻麗作為審美的標準。可見，漢魏之際實開啟了廣義的駢文批評的先聲。

假若「連珠」體算作駢體文的一種，則由魏入西晉的傅玄所寫的《連珠序》便是最早的直接的駢文批評的文獻。傅玄，字休奕，北地泥陽人。博學善屬文，晉代郊廟歌多出其手，長於樂府，並寫作多篇駢賦，屬對工整，對駢文創作自有深切體悟，生年較陸機為早。「連珠」是東漢時期出現的一種以偶句行文的文體，現存最早的「連珠」文是東漢揚雄所撰：

臣聞：明君取士，貴拔眾之所遺；忠臣荐善，不廢格之所排，是以岩穴無隱，而側陋章顯也。

揚雄之文已開四六對句的先聲，亦為後世「連珠」文奠定了寫作的範式。班固亦有《擬連珠》五章，均用整練的排比句寫成。如其一：

臣聞：公輸愛其斧，故能妙其巧；明主貴其士，故能成其治。

同為以四六對句行文的駢儷文，並深得傅玄的讚賞。傅玄《連珠序》論述了「連珠」的起源、流變及風格特點等，並對相關的作家作出評價。論起源云：「所謂連珠者，興於漢章帝之世，班固、賈逵、傅毅三子，受詔作之，而蔡邕、張華之徒又廣焉。」論風格特點則云：「其文體辭麗而言約，不指事說事情，心假喻以達其旨，而賢者微悟，合於古詩勸興之義，欲使其歷歷如貫珠，易觀而可悅，故謂之連珠也。」而最能體現「連珠辭麗」風格特點的是「班固」的創作。故云：「班固喻美辭壯，文章弘麗，最得其體。」其次，蔡邕、賈逵、傅毅各有所失，不及班固，故曰：「蔡邕似論，言質而辭碎，然其旨篤矣。賈逵儒而不豔，傅毅文而不興。」

稍後於傅毅而與駢文批評相關的有陸機。陸機一方面承接漢魏追逐藻麗的餘風，另一方面進一步提出「音聲之美」的要求。陸機《文賦》本身全用對句行文，惜其文論並未就「對偶」提出獨特見解。《文賦》之文，涵蓋甚廣，故並非直接的專門的駢文批評而只能是間接的。其「文」義包括詩、賦及其他共十種文體，故其賦文中提出「詩」、「賦」、「碑」、「誄」、「銘」、「箴」、「頌」、「論」、「奏」、「說」等十種文體的寫作要求。然而，除詩、賦之外，其餘各種文體在六朝大多已用駢體形式寫作。故《文賦》實際上已間接成為駢文批評的專論。《文賦》也總結了一些文學創作的經驗，論及創作前的準備與構思活動的要點；文辭的運用與音聲美創造等語言形式的審美理想，以至風格與體裁問題、藝術技巧與文病問題等。陸機把語言形式作為藝術技巧的重要範疇，正是說明陸機也認同「藻飾之美」與「音聲之美」是駢文的重要修辭形態。《文賦》云：「遊文章之林府，嘉麗藻之彬彬。」^[5]「浮藻聯翩，若翰鳥纓繳而墜曾雲之峻」^[6]、「其會意也尚巧，其遺言也貴妍」^[7]、「或藻思綺合，清麗千眠。炳若緝繡，悽若繁絃」^[8]、「彼瓊敷與玉藻，若中原之有菽。」^[9]均多處指出「華辭麗藻」的重要。顧施禎釋「玉藻」云：「《禮記》曰：『天子玉藻』皆喻文章之美也。」^[10]較漢魏人進步，陸機更提倡「音韻之美」。《文賦》云：「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11]、「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12]音韻在文章中的美學作用與藻飾同樣重要，故陸機《文賦》初步帶出駢文另一修辭要素——音韻美。

繼《文賦》後另一與駢文批評相關的重要文獻是《文心雕龍》。與《文賦》一樣，《文心雕龍》之「文」是廣義的，其涵括的範圍有詩、賦、騷、諸子、箴、碑、頌等多種文體，而各種文體有散行也有駢偶，故《文心雕龍》原非駢文批評的專論。在其「文體論」與「創作論」中所援引的例子亦不限於駢文，也有詩歌在內。故在「駢文」的觀念尚未明確之時，其對駢文的批評只能是間接的。其對駢文批評發展的最大貢獻，是最先就幾種駢文修辭的形態作出系統的專論。固然，這幾篇專論施諸詩歌也無不可，但劉勰既就當時的詩文現象而作出總結，畢竟已涉及當時盛行的駢文修辭現象，具有駢文批評的成份。

《文心雕龍》創作論中，《麗辭》、《章句》、《聲律》、《情采》、《事類》五篇便是駢文五種修辭形態——對偶、句法、聲律、藻飾、用典——的專論。較諸陸機《文賦》只涉及「藻飾」與「音韻」已是大大的擴展了，並已觸及駢文美學的核心範疇。《麗辭》篇系統地總論了「對偶」這種修辭手法。「對偶」在當時的詩文已成普遍運用的修辭手法，因此《麗辭》篇所論的問題，是就詩與文而言，而非專論駢文的。正如內文也引用了張協的《七哀詩》、張華的《雜詩》為例，便可見詩與文並論的特徵。

《麗辭》篇的另一重大貢獻是揭示了對偶的重要原則，後世在詩文中的對句運用也離不開這些原則。劉勰指出對偶有四類：「故麗辭之體，凡有四類。言對為易，事對為難，反對為優，正對為劣。言對者，雙比空辭也；事對者，並舉人驗者也；反對者，理殊趣合者也；正對者，事異義同者也。」

《章句》篇所論與駢文有兩點相通之處。第一，駢文特為講求長短句互間的運用，是構築文章基本骨架，也是駢文的基本佈局。第二，《章句》篇專論了駢文常用的典型句式，「四言」及「六言」句，對此後四六文的形成不無影響。劉勰從節奏感的角度揭示了四言與六言的美學特徵。「四言」句雖短，但音節並不急促；六字句雖然較長，音節並不迂緩。至於三言句、五言句的運用是因應情勢變化而適當調配的。

《聲律》篇也是詩文並論的。但其中的聲律原則實可應用於駢文的聲律。「凡聲有飛沉，響有雙迭。雙聲隔字而每舛，迭韻雜句而必睽。」所有的聲音不外「飛揚」和「下沉」兩種，駢文的音韻最重要的是兩種音聲互間並用，而不要偏向單獨運用。

《情采》篇與駢文相關之處在藻采的運用。藻飾是駢文自漢魏以來發展而成的必然修辭手法，《情采》便就這種修辭手法提出健康的發展途徑。劉勰認為文章不可缺少文采，否則便不成文章：「聖賢書辭，總稱文章，非采而何？」

《事類》篇提出了用典的原則，可供後人借鑒：「綜學在博，取事貴約，校練務精，招理須核，眾美輻輳，表裏發揮。」即綜合學問在於廣博，選取事例重在精簡，考核提練典故力求精當，不能有誤。凡此均豐富了駢文用典的理論色彩。

《雜文》篇則分論了「對問」、「七」及「連珠」體，是繼傅玄《連珠序》以還，另一專論「連珠」之文。

綜言之，《文心雕龍》雖非駢文批評的專論，但也涉及與駢文相關的美學內容，其對駢文五種修辭技巧的論述，實已開啟駢文批評的先聲，初步構建了駢文美學。

二、成型期——隋唐五代

隋唐是駢文批評史上的成型期。所謂成型，即由六朝時駢散觀念尚未成熟，逐漸演變成駢散對立，觀兩者的分野逐漸明晰。隋唐文論一方面繼承六朝曾出現的反浮靡文風的批評，使駢文也被牽進這浮靡文風的圈子中，受到抨擊；另一方面隨著古文運動的興起，使駢散觀念較前進步明晰，導致駢散的爭論。

隋朝及初唐對駢文的批評仍舊是間接的。駢文被捲進受反對的漩渦中主要原因，在於其與浮靡文風的牽連。指斥浮靡文風之人，原未有直接標示駢文之名，其矛頭一向只是指向華豔而內容空洞之文，而非駢文的本質。隨著大一統王朝的建立，統治者往往為了挺立儒家治國的典範，便大力推行教化，「文學功用論」便乘時而起。隋代便是開啟此種風氣之先，後來宋朝如是、明、清亦如是。「教化論」與「功用論」並馳，影響創作風氣頗巨，一則透過政治影響力，使下民迫於接受與跟從；一則通過教化，使下民的意識受到潛移默化。其直接而巨大之影響，使文章喪失了藝術的內涵與價值。

隋初的李諤便是「教化論」與「功用論」的代表。其《上書高祖革文華書》雖未直接指斥駢文之非，然其指斥六朝文與儒家之道、教化之義脫節，便是間接地批評了駢文的發展。其言曰：

降及後代，風教漸落。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聘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踐賢愚，唯務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至如義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嘗入耳。

顯見李諤所針對的，不僅是華靡文風的盛行，更重要是魏晉以後之文，欠缺「教化」的功用，也是對其時盛行的駢文進行了間接的批判。

李諤之外，尚有王通論文，多從「教化論」出發，雖未對駢文直接批判，然其對六朝文人的指斥，實已包含對駢文的批評。其《中說·事君篇》云：「謝靈運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則典。鮑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怨；吳筠、孔圭，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謝莊、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或問孝綽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或問湘東王兄弟。子曰：貪人也，其文繁。」其對六朝文人的評論，純從道德教化角度考慮，完全蔑視文藝創造的價值，把其中情文並茂的作品一筆抹殺，是過於主觀的偏激評論，也是間接的對六朝駢文的偏頗妄論。王通之孫王勃在文論上承接李諤與王通一路，對六朝文仍是全盤否定。其《上吏部裴侍郎啟》曰：「聖人開物成務，君子以立言見志。遺雅背訓，孟子不遺；勸百諷一，揚雄所恥……自微言既絕，斯文不振。屈宋導澆源於前，枚馬張淫風於後。談人主者以宮室苑囿為雄，敘名流者以沉醜驕奢為達。故魏文用之而中國衰，宋武用之而江東亂。雖沈謝爭鶩，適先兆齊梁之危；徐庾並馳，不能免周陳之禍。」可見其論文的基調仍以儒家教化之義出發，反對藻飾浮靡之文，更歸咎這是國運衰微的原因。與李諤、王通不同，王勃之文因為是用「駢體」寫成，其行文本身就是工整的儷句，可知，王勃所反對的是欠缺儒家德教的內容，而非駢文的藝術形式。縱觀王勃的文章寫作，大部分是駢文，更可證明他所反對原非駢文的本質，否則便是心口不一，理論與創作不符。

初唐另一類重要的文學批評，是發自史學家對文學的評斷，如令狐德棻、魏徵、李百藥等。其對駢文的批評亦為間接的。他們雖也針對六朝的華豔文風，但言論較李諤等人持平，至少並未一筆抹殺魏晉及南朝詩文的藝術價值。兼且，他們行文亦多用駢句，可知他們對駢儷的寫作形式並未抗拒或反對，其所反對者，仍為尚文過於尚質的不良風氣。其中尤以令狐德棻的《周書·王褒傳論》便是用精煉的駢句寫成，本身已為精美的駢體論文。其論亦肯定了屈宋文質兼備的成就，也肯定了魏晉文「侈麗」的特色。惟對庾信之文頗有微言：「然則子山之文，發源於宋末，盛行於梁季，其體以淫放為本，其詞以輕險為宗，故能誇目侈於紅紫，蕩心逾於鄭衛。昔楊子雲有言：『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若以庾氏方之，斯又詞賦之罪人也。」其所謂淫放、輕險，為宮體詩文的特徵，故其針對的大抵為庾信前期的宮體詩文，故對於庾信、王褒大體上仍是肯定的，故又曰：「唯王褒、庾信，奇才秀出，牢籠於一代。」至於魏徵文論亦以「文質兼美」為主，故未如隋代及初唐的一些文論家，以政教批判浮豔之文，而是對南朝詩文的藝術成就是加以肯定的。故云：「自漢魏以來，迄乎晉宋，其體屢變，前哲論之詳矣。暨永明、天監之際，太和、天保之間，洛陽、江左，文雅尤盛。于時作者，濟陽江淹、吳郡沈約、樂安任昉、濟陰溫子昇、河間邢子才、鉅鹿魏伯起等，並學窮書圃，思極人文。縹緲鬱於雲霞，逸響振於金石，英華秀發，波瀾浩蕩，筆有餘力，詞無竭源。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若能掇彼清音，簡茲累句，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則文質斌斌，盡善盡美矣。」對於前此文評家所針對的「縹緲」、「英華」，魏徵卻予以肯定，而其對南朝文人的肯定，無形中亦是間接對南朝駢文的肯定。

盛唐中後期，隨著蕭穎士、李華、賈至、元結、獨孤及、梁肅等古文運動先驅的出現，駢文批評也由間接的走向直接的。獨孤及便是鮮明例子。其《檢校尚書吏部員外郎趙郡李公中集序》便名正言順地抨擊「儷偶章句」：「自典謨缺，雅頌寢，世道陵夷，文亦下衰。故作者往往先文字後比興，其風流蕩而不返。乃至有飾其詞而遺其意者，則潤色愈工，其實愈喪。及其大壞也，儷偶章句，使枝對葉比，以八病四聲為楷準，拳拳守之，如奉法令。聞皋繇、史克

之作，則呶然笑之。天下雷同，風驅雲趨。」獨孤及所針對的是講求對偶、聲律、藻飾的駢文無疑，但其矛頭實也指向有文而無質，內容空洞，無益於世道的文章。總的而言，從其直接對駢文的批評可見，反對駢文片面追求形式美的立場是很鮮明的。

降及中唐，韓愈、柳宗元更進一步推進駢散的對立，從古文創作實踐，完成古文理論與創作兼備的局面，提升了古文的美學層次。前此論古文者，多為理論提出與闡述，在創作上未見有傑出成就及產生重大影響，直至韓柳的出現，奠定古文創作的典範，足與駢文抗衡。其中尤以柳宗元繼承獨孤及直接的駢文批評，對駢文有所抨擊。

韓愈雖未直接以「駢文」或「儷偶」等名詞指斥駢文，然從其對形式美文及六朝文的批判可知，其對駢文的立場是持反對意見的。其《上宰相書》云：「而方聞國家之仕進者，必舉于州縣，然後升于吏部，試之以綉繪雕琢之文，考之以聲勢之逆順、章句之短長，中其程式者，然後得從下士之列。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策，不由是而稍進，萬不有一得焉。」韓愈針對當時科舉考試制度，只注重文章的形式美，如聲律及章句的運用而不重內容，以至縱有優良國策者，或因不善修飾文辭而無法晉身仕途，為國效命。固然，韓愈不滿的原為考試制度本身，而非否定形式美的重要，但由於唐代以詩賦取士，又試以表、判等公文皆以四六為之，故其反對四六文的立場是顯見的。

其次，韓愈似乎也隱言四六文追求聲律與章句的形式美，往往拘限了文意的表達，使議政的論題得不到透徹的發揮，造成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策」也無法上達朝廷。此外，韓愈對六朝文的徹底否定，也無疑是對駢文的否定。其《送孟東野序》曰：「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于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為言也雜亂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為乎不鳴其善鳴者也。」韓愈明言魏晉以後的文章成就不及古人，文辭淫哀雜亂，可見其對六朝駢文亦存一筆抹殺的態度。柳宗元對駢文的批判更為直接。其《乞巧文》曰：「眩耀為文，瑣碎排偶。抽黃對白，唵哢飛走。駢四儷六，錦心繡口。宮沉羽振，笙簧觸手。覘者舞悅，夸談雷吼。獨溺臣心，使甘老醜。嚚昏莽鹵，樸鈍枯朽。不期一時，以俟悠久。」可見，柳宗元明確標示其對駢儷四六尚藻飾、尚聲韻的特質予以徹底否定。此外，進士黃滔在《與王雄書》中也直指駢儷之非：「夫儷偶之辭，文家之戲也，焉可責其戲于作者乎？是若揚優喙，干諫舌，啼妾態，參婦德，得不為罪人乎？」黃滔也是不遺餘力的貶低駢儷的價值，以為是文家的遊戲，也像是伶人賣唱，小妾撒嬌，甚至是為害人間的罪人。柳宗元與黃滔的駢文批評均有共通點，就是欠缺客觀的論證，反對駢文，並未提出充分的理據，以致流於意氣之爭，為鞏固古文的正統地位而對駢文的一切藝術價值予以否定。

晚唐李商隱雖對駢文的評論不多，卻也為駢文批評作出貢獻。其《樊南四六甲集序》便對自己所作的駢文作出評價，更重要的是為駢文命名「四六」。其言曰：「樊南生十六能著《才論聖論》，以古文出諸公間，後聯為鄆相國。華太守所憐，居門下時，敕定奏記，始通今體。後又兩為秘書房中官，恣展古集，往往啞嚙於任昉、范雲、徐庾之間。」李義山指出他學文的歷程，十六歲能為古文，後居於鄆相國令狐楚幕下時，因工作所需，學會用駢文寫作奏記等公文。李義山自評其駢文的藝術淵源，是出入於南朝的任昉、范雲、徐陵、庾信，可見其駢文的成就，實也得力於六朝駢文甚鉅。第二，他又為駢文辯護，指出駢文的審美效應與古文是沒有分別的。「有請作文，或時得好對切事，聲勢物景，哀上浮壯，能感動人。」駢文在聲色的刻劃、氣勢的鋪排、景物的描劃方面，均能產生巨大的感染力；駢文也善於抒情，其感人的力量也相當巨大，實可與古文分庭抗禮，也並非如古文家的偏頗評論，以為駢文徒具形式，一無是處。正是由於這原因，其善古文之弟聖僕曾請他改作古文，李義山也不為所動，堅持駢文的創作。故云：「仲弟聖僕，特善古文，居會昌中進士，為第一二，以今體規我，而未焉能休。」第三，李義山繼柳宗元後，以「四六」指稱當時的駢體文，更開創了以「四六」作為駢文集的命名。故《樊南甲集序》解釋了「四六」之名及文集命名為四六的原因。「因筆削衡山，洗硯湘江，以類相等色，得四百三十三件，作二十卷，喚曰《樊南四六》。四六之名，六博格五、四數六甲之取也。」「四六」一詞，本為博奕遊戲，馮浩注云：「楚辭：『現蔽象棋，有六博些』注曰：『投六箸，行六棋，故云六博』鮑弘《博經》：『用十二棋，六白六黑』」可見「六博」是古代一種用六白六黑棋子對弈的遊戲。「四數六甲」也是蒙學中所學的干支數學，故馮浩注引王粲《儒吏論》云：「『古者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按：『六年所教之數，一至十也；五方即方名，此四數也，其四方四時之謂歟！』」「四六」的命名，在駢文史上有劃時代的意義，使「四六文」成為駢文的代稱，也開啟了「宋四六」的先河。

三、轉型期——宋代

宋代是駢文批評的自覺時期，又由於與先前的駢文批評特質出現變異，故也是轉型期。所謂自覺，是宋人已有意識地著述與駢文相關的評論著作，如王銍的《四六話》、謝伋《四六談塵》、楊淵道《雲莊四六餘話》及王應麟的《辭學指南》等。自李商隱標示「四六」之名，明確了「四六文」的觀念後，宋代承其餘緒發展成「宋四六」的時代。宋代駢文自經古文家歐陽修、蘇軾等人改造後，形成以古文為四六文的獨特風格，處處與六朝及唐代駢文迥異，駢文史上稱之為「宋四六文」。駢文雖自隋唐以後進入駢散論爭的年代，然其生命並未因古文的壓制而銷歇，反之到了宋代又有新的發展。駢文在宋代演化成「四六文」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公文與科舉考試的需要與影響。唐宋二代，朝野

間所使用的應用文書、公文，以至科舉考試的作文部分仍然沿用駢文。王應麟《辭學指南》便清楚指出宋代進行科舉改革，仿效唐代的「辭藻宏麗」及「文章秀異」科，於是也設置「宏詞科」。紹興三年七月改為「博學宏詞」科，主考十二種文體，六道題目，共三場考試，每三年一試，主要考核考生的四六文書寫能力。基於實際的需要，考生往往迫於研讀及寫作四六文，遂使四六文在宋代仍有旺盛的生命力，於古文運動的洪流中，依然屹立不倒。歐陽修在《答陝西安撫使范龍圖辭辟命書》中便說明因科舉需要被迫學習及寫作「四六文」：「然其弊類俳，歐公深嫉之，曰：『今世人所謂四六者，非修所好。少為進士，不免作。自及第，遂棄不作。在西京佐三相幕，於職當作，亦不為作也。』」^[13]伴隨著宋代四六文的開展，為了滿足士子應考及朝野書寫的需要，也就開創了探討駢文理論批評專著的先河。

綜觀宋代四六文話的內容，大致探討了幾方面的問題，如四六文的方法論與風格論，包括對偶、用典、字句修辭、文法、詞法等；也涉及四六文的源流與演變等。宋代最早出現的駢文批評專著是王銍的《四六話》，成於北宋徽宗宣和四年（1122）。《四六話》評論了四六文的演變歷程、對偶、用典、立意及其他修辭的問題。如論宋四六文的流變云：「本朝自楊、劉，四六彌盛，然尚有五代衰陋氣，至英公表章，始盡洗去。四六之深厚廣大，無古無今，皆可施用者，英公一人而已，所謂四六集大成者。至王岐公、元厚之四六，皆出英公。王荊公雖高妙，亦出英公，但化之以義理而已。」王銍把宋代四六文的起源追溯到西崑體的楊、劉，並指出他們的四六文與其詩風一樣，雜有五代的習氣。北宋初期的駢文家以夏竦（英公）成就較大，堪稱四六文的集大成者，其後較有成就的王珪、元絳、王安石都深受夏竦的影響。

《四六話》更多的篇幅談到用事、立意等其他修辭技巧。王銍細緻地把用典分成「生事」與「熟事」兩類，並以「伐木」與「伐山」作比喻。「四六有伐山語；有伐材語。伐材語者，如已成之柱桷，略加繩削而已；伐山語者，則搜山開荒，自我取之。伐材，謂熟事也；伐山，謂生事也。生事必對熟事，熟事必對生事。若兩聯皆生事，則傷於奧澀；若兩聯皆熟事，則無工，蓋生事必用熟事對出也。」所謂「生事」即生闢的典故；「熟事」即熟悉的典故。王銍以為對聯的上聯若用生闢典事，則下聯應以熟事相對，反之亦然。句式方面，王銍提出：「四六格，句須襯者相稱乃工，方為造微。蓋上四字以喚起下六字也。此四六之格也。」四六對四六的複句對中，上四字需與下六字意義連貫，一氣呵成，這也符合四六文寫作的實際，可使文意不致因為隔對而割裂。此外，王銍強調四六文的創新，曰：「四六貴出新意，然用景夫多而氣格低弱，則類俳矣。唯用景而不失朝廷氣象，語劇壯而不怒張，得從容中和之道，然後為工……凡此之類皆以氣勝與語勝也。」王銍以為理想的四六文，是不徒以景語充斥文章之中，景語的運用須與公文的典雅風格相合，更重要是以氣魄取勝。綜言之，王銍可說是中國駢文批評史上第一位自覺地對四六文論作出系統整理之人，其「以氣論文」，與古文家如韓愈重文氣同出一轍，使四六文論更形豐富，無疑是王銍對四六文論的一大開拓與貢獻。

至紹興十一年，有謝伋的《四六談塵》面世。《四六談塵》既斟酌四六文的命意遣詞，也闡述了四六文體的流變。謝伋要求四六文應「言約意簡」，發揮駢體文簡約的語言特點，故曰：「王荊公在金陵，有中使傳宣撫問，並賜銀合茶藥，令中外各作一表，既具稿，無可于公意者，公遂自作，今見集中。其詞云：『信使恩言，有華原隰；寶奩珍劑，增賁丘園。』蓋五事見四句中，言約意簡，眾以為不及也。」謝伋引王荊公的例子，說明駢語可以簡短的語句，包含豐富的意思，王荊公之例便是四句句包含了五個典故，達致言簡意賅的效果。此外，在序文中也論及四六文的文體演變及其與科舉的關係：

三代兩漢以前，訓、誥、誓、命、詔、策、書、疏，無駢儷粘綴，溫潤爾雅。先唐以還，四六始盛，大概取便於宣讀。本朝自歐陽文忠、王舒國敘事之外，作為文章，制作渾成，一洗西昆磔裂煩碎之體，厥後學之者益以眾多。況朝廷以此取士，名為博學宏詞，而內外兩制用之，四六之艾，誠曰大矣。下至往來箋記、啟狀，皆有定式。故設之應用，四方一律，可不習知。

謝伋探討了各類古代文體駢化的歷程，指出古代文體演化成四六是在漢魏以後。三代兩漢以前，文體仍未有「駢儷粘綴」。謝伋也初步指出公文駢偶化的原因，在於駢儷的語言形式使人易於宣讀，其音聲美的效果，可使諷誦時增加音聲上的美感，使音聲更為動聽。此外，謝伋也讚揚了歐陽修、王安石對改變宋初西昆四六文風的貢獻，扭轉西昆的瑣碎弊病，使學子有所依從，也促成宋四六文的興盛。謝伋更進一步剖析了宋四六文興盛的原因，與科舉制度是密不可分的。宋代開博學宏詞科，規範了四六文的寫作，遂使天下士子風靡而從。凡此亦是謝伋對四六文論的開拓與貢獻。

楊淵道《雲莊四六餘話》的駢文批評也不外是對四六文體的闡述及宋四六文流變的分析。楊淵道注意各類四六應用文的不同體製與應有風貌，從而指出各自的寫作手法。故曰：「大抵制誥箋表，貴乎謹嚴；啟疏雜著，不妨宏肆，自各有體，非名世大手筆，未易兼之。」此外，楊淵道對宋四六文的評論有進一步的剖析，一方面讚揚蘇軾四六，一洗宋初四六近似俳優的弊端，一方面指出從西昆四六至歐蘇四六，駢文已分成蘇王兩派。其言曰：

本朝四六，以劉筠、楊大年為體，必謹四字六字律令，故曰四六。然其弊類俳……皇朝四六，荊公謹守法度，東坡雄深浩博，出於准繩之外，由是分為兩派。近時汪浮溪、周益公諸人類荊公，孫仲益、楊誠齋諸人

類東坡。

王安石的四六文嚴謹遵守駢文格律，反之蘇軾不受受羈束，故往往有乖格律，這是蘇王最大的分別之處。由是，師法王荊公的有汪藻、周必大等人，風格也類似荊公；學習蘇文的如孫覲、楊萬里等則與東坡風格相近，從而形成蘇王兩派。

至南宋有王應麟的《辭學指南》。《辭學指南》因應宋代科舉增設的博學宏詞科而編撰，使學子應考有所依從，故曰「指南」。由於博學宏詞旨在考核學子的四六文體的寫作能力，故是書對各種四六文體有更詳盡的剖析，並對其寫作手法有更深入的闡述。故是書第一卷總論編題、文法、語忌、誦書、文選、合誦、編文等問題。其餘三卷即按十二種四六文體分類評析，提示各種寫作手法，更附錄歷屆試題及範文等。《辭學指南》最大的貢獻便在於詳析了各種四六文體的源流、體製與寫作手法。如論「誥」云：

誥，告也。其原起於湯誥。周官大祝六辭三曰誥，士師五戒二曰誥。成王封康叔、唐叔命以《康誥》、《唐誥》。漢元狩六年立三子為王，初作誥。唐白居易集翰林曰《制誥》，中書曰《制誥》。蓋內外命書之別，皇朝勅除試誥，而命題亦曰制。（此自紹興以來僅一命題）

可見「誥」的源流起於商朝的《湯誥》，及至周朝也出現《康誥》及《唐誥》。漢唐繼之，如白居易有《制誥》等。王應麟也注意各類文體的不同風貌。如論表云：「大抵表文以簡潔精緻為先，用事不要深僻，造語不可尖新，鋪敘不要繁冗，此表之大綱也。」

綜觀宋代四六文的理論與批評，開拓了四六文體的闡述，包括其源流、演變、體製、寫作手法等，又對四六文的語法、修辭等作出系統的探賾，並從審美角度對宋四六文的演變作出分析，凡此為後世的駢文理論與批評的建設，起著先導的作用。

四、沉寂期——元明二代

元明二代的駢文批評，伴隨著四六文創作的衰微而顯得沉寂，「四六話」之類的文評專著已不多見，故稱元明二代為沉寂期。元代駢文批評專論獨有元代中葉陳繹曾《四六附說》。上承宋四六文論的主要命題，《四六附說》也探討了宋四六文的流變，進一步分析了蘇王四六的異同，並指出四六文的寫作法則，從而提出其審美理想。陳繹曾認同宋四六文可分蘇、王兩派：

四六之本：一曰約事，二曰分章，三曰明意，四曰屬辭，務欲辭簡意明而已，此唐人四六故規，而蘇子瞻氏之取則也。後世益以文華，加以工致，又欲新奇，於是以用事親切為精妙，屬對巧的為奇崛，此宋人四六之新規，而王介甫氏之所取法也。

陳繹曾認為蘇軾四六文是師法唐代四六，有著「言簡而意義明晰」的特點。反之，王安石是典型的宋四六文代表，有著藻飾文華、新奇工麗、用典精妙、屬對奇巧的藝術特徵。這種對蘇王四六文的評價也是前此未有的。他又強調四六文之「法」，能致其法，也就是四六審美理想的達成：

變而為法凡二：一曰剪裁，二曰融化，能者得之，則兼古通今，信奇法也，不能者用之，則貪用事而晦其意，務為屬對而澀其辭，四六之本意失之遠矣，又何以文為哉？

陳繹曾以為，四六文之法在融通古今之時，亦須注重達意，反對盲目師古與用典，也不主張為求屬對工巧而使文意晦澀。可見，他反對「以辭害意」，語言形式應為文意而設，而不應本末倒置，貪求形式之美而阻礙文意的表達。這種以達意為主的理論，無疑是健康進步的。

明代駢文批評包含兩大類型，一類是對「六朝文」的批評，從而牽涉駢文在內，因此是間接的；一類是對歷代駢文的批評，是直接的。前者代表人物有王世貞、屠隆、張溥、孫月峰等；後者則有蔣一葵、王志堅等。

明代初年，隨著文章政教風氣的盛行，四六文是受到壓制的。因此，明代初年對四六文的評價大多是反面的。如宋濂評曰：「辭章至宋季，其弊甚久，公卿大夫視應用為急，俳諧以為體，偶儷以為奇，靦然自負其名高。」另一文臣王禕亦云：「古語變而四六，古聲變而詞曲，文之弊也甚矣。」他們都把文章流弊歸咎至駢儷文的應用，對駢文是甚為輕視的。至明代中期，文學批評的主流是復古文論，前後七子師承的對象是秦漢。另一文章流派「唐宋派」則崇尚唐宋古文。故在明代中期，「六朝文」大致上是不受提倡，不被重視的。然而，在這主流中，仍有部分文人喜好六朝文，從而對六朝文作出評論，間接促成六朝駢文批評的出現。自穆宗隆慶至神宗萬曆之際，王世貞影響文壇較大，地位崇高，其《藝苑卮言》便曾勸導時人須熟讀「《六經》、《周禮》、《孟子》、《老》、《莊》、兩京以還至六朝韓柳」，使「六朝文」地位與秦漢文並列。此外，後七子中的屠隆也在《鴻苞·論詩文》中強調：「論六朝者，當就六朝求其至處，不必責其不如漢魏。」王世貞及屠隆對駢文的批評均為片言隻語，未及明代後期張溥所論詳備。

另一萬曆年間對駢文間接評論的是孫月峰。其評點見於清代于光華《文選集評》中。孫月峰就《文選》中收錄的駢文曾作出片斷式的評語，故未成系統的議論。從其評語可見，其論斷多從一般文章的修辭技巧著眼而較少從駢文學的要領入手。如評任昉《為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云：「此篇合璧多，貫珠少，然風度自勝。大約撮得句巧，煉

得意秀，畔得明，應得響，其趣味全埋在用事中，所以不覺其堆鋪。」著眼於字句鍛煉。又如評劉琨《勸進表》云：「不章鍛句煉，然豪氣有餘，驅遣處亦自朗暢，文采爛如，自是偉作。」同樣著眼於章句鍛煉，但亦留意文章的氣勢與文采的修飾。至明代末年，張溥的出現才系統而細緻地對六朝駢文有所論述。張溥為明末熹宗天啟年間至思宗崇禎年間人，亦為明代少數熱愛六朝文的士人之一。其編纂之《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推進了研習六朝文之風，闡述了對六朝駢文諸家的評論，如鮑照、蕭統、沈約、江淹、任昉、徐陵、庾信等。從張溥的評論可見其對六朝駢文的推崇及對駢文審美理想的看法。

明代對駢文直接批評的著述不多，較其要者有蔣一葵的《堯山堂八朝偶集》及王志堅的《四六法海》。蔣書主要摘錄明代以前佳美的對句，然後附以評語。然其評語仍屬片斷式批評，往往過於簡約，未成系統議論，所論亦鮮從駢文學角度出發。如評駱賓王《為齊州父老請陪封禪表》云：「工麗真切，泰岱增色。」簡單八字，用諸古文亦無不可。又評駱賓王《揚州看競渡序》：「麗筆賦豔麗語」亦頗簡約。其論較可觀的是勾勒了唐代四六文的流變：「唐初沿六朝綺麗之風，賓王輩四六聲悅實工，豐骨稍掩，至河東始麗以則。」指出初唐駢文崇尚文飾的風氣，直至柳宗元才算是文質兼備。明末王志堅《四六法海》雖亦以片斷式評語為主，但其《自序》卻系統闡析了駢文自南北朝至宋元的流變：

渡江而後日趨績藻，休文出，漸以聲韻約束之，至蕭氏兄弟、徐庾父子而斯道始盛。唐文皇以神武定天下，在宥三十餘年，而休文一遵陳隋，蓋時未可變耳。永徽中，人主優禮詞臣，時則有燕許鴻軒，崔李豹別，而英公一檄，竟出自草澤手，當時人才何其盛歟！至於沿習既久，遂成蹊徑，文移批答，賓主談諧，輒用偶語，此亦天地不得不變之勢矣。然昌黎初出，即裴晉公亦駭弗許，蓋習尚之漸人也如此。河東之為文異於是，壺子時見杜權，糠粃猶為堯舜，吾師乎！吾師乎！

與眾多明人不同，王志堅首先肯定了六朝駢文的成就，如蕭氏父子、徐庾父子等。唐代則肯定了燕許、陸贄等成就，而對柳宗元特為推崇，以為可堪師法。對宋代則承接宋人餘論，把宋四六分為蘇、王兩派，故曰：「宋之四六希有源流譜派……撮其大要，藏曲折於排蕩之中者，眉山也；標精理於簡嚴之內者，金陵也。」至元代，四六文格日降，走向通俗化，俚語化，故不值一提：「至其末流，耳有譚語如優，俚語如市，媚語如倡，祝語如巫……四六至此，直是魔胃。」王志堅對駢文發展的勾勒，後世大抵與之相同，已無出其右。

五、成熟期——清代

清代是駢文批評的成熟期。一則由於駢文批評的範疇已大大擴展，二則駢文理論體系日益壯大與完善，故稱之為成熟期。清初至乾嘉以前，駢散批評大致上在駢散論爭的過程中展開，駢文家為鞏固駢文的理論基礎，與古文抗衡，自必發掘駢文的理論內涵，豐富其理論體系，遂使駢文理論日益完善。

清代是駢文創作的復興期，不論在作家人數、作品數量、駢文集的編纂均是歷朝之冠。清初駢文名家有陳維崧、毛奇齡、毛先舒、吳綺、吳兆騫等；乾嘉年間則有袁枚、邵齊燾、劉星煒、吳錫麒、孔廣森、孫星衍、洪亮吉、曾燠等號稱「駢文八大家」。清代後期則有張惠言、樂鈞、王縣、王衍梅、劉開、董祐誠、李兆洛、金應麟等號為「駢文後八大家」。駢文總集則有李兆洛《駢體文鈔》、姚燮《駢文類苑》、彭兆蓀《南北朝文鈔》、許梈《六朝文絜》、王先謙《駢文類纂》、陳均《唐駢體文鈔》、彭元瑞《宋四六選》、曾燠《國朝駢體正宗》、張鳴軻《國朝駢體正宗續編》、吳鼎《八家四六文鈔》、王壽榮《後八家四六文鈔》、鍾惺《四六雲濤》、譚元春《四六金聲》、李自榮《四六函函》等，還有大量駢文別集，均具見駢文創作的繁盛。伴隨駢文興盛的氛圍，駢文理論批評也繁盛起來。然而，清代駢文批評的專著不多，文論家的議論多散見於文集序或書信中。像宋「四六話」之類的批評專著只有陳維崧的《四六金針》、孫梅的《四六叢話》、李漁的《四六初徵》等。

清代初年，駢文家較多為駢文辯護，糾正前人對駢文的誤解。陳維崧率先在《詞選序》中指出庾信《哀江南賦》與徐陵的書信可與《離騷》、《左傳》、《國語》等經典相等，重新提昇駢文的文學地位。陳維崧又有《四六金針》一書，探討了駢文的寫作手法，對元代中葉陳繹曾的《四六附說》提出的四種唐代駢文：「約事、分章、明意、屬辭」作更深入的剖析。此外，又對駢文的主要修辭手法，如對偶及典故運用提出見解。例如指出對偶運用應配合音聲美的表現：「欲讀者便於聲音，故切平仄；欲聽者不致迷誤，故平易其辭，此又四六屬辭所以定粘律、明句讀、易文辭之本意也。」駢文一向予人艱澀難讀之感，陳維崧則主張平易其辭，以達意為首要目的，可說是健康的駢文理論。在闡述駢文寫作手法方面，《四六金針》是較有系統的，大致上從七方面概括了駢文的寫作技巧，即古法、今法、目、體、制、式、格等，均對駢文理論的建設有莫大的貢獻。

及至乾嘉時期，不少駢文家提出他們對駢文的見解，然大多散見於序跋與書信中，未成系統的著述，如袁梅、孔廣森、吳鼎、曾燠、彭兆蓀、阮元等；另有莊士銓、李兆洛在駢文總集中有較多片斷式批評與理論闡析。在眾多的駢文批評家中，最具系統闡析的當推孫梅的《四六叢話》。（詳見拙著《四六叢話研究》）清代中後期則有曾國藩、劉開、朱一新等進一步深化駢文理論。

乾嘉時期的駢文批評均有一共同點，就是環繞著「駢散論爭」的命題上進行討論。有為駢文辯護的，如孔廣森曾言：「駢體文以達意明事為主，不爾則用之婚啟，不可用之書札；用之銘誄，不可用之論辯，直為無用之物。六朝文無非駢體，但縱橫開闔，一與散文同也。」（孫星衍《儀鄭堂遺稿》引）指出駢文也像古文一樣講求達意，在文意的表達，以致實用功能而言，駢文實與散文無異。有為駢文建立正統的源流的，如吳鼎在《八家四六文鈔序》中云：「夫一奇一偶，數相生而相成；尚質尚文，道日衍而日盛。暘谷幽都之名，古史工於屬對；觀閔受侮之句，葩經已有麗言。道其緣起，略見源流。」指出駢文紹自上古，源遠流長，具正宗的文統。也有力主駢散並重，不應互為抑揚，相互論爭，如曾國藩《國朝駢體正宗序》曰：「夫駢體者，齊梁人之學秦漢而變焉者也，後世與古文分而為二，固已誤矣……古文喪真，反遜駢體；駢體脫俗，即是古文，迹似兩歧，道當一貫」，指出駢散實同出一源，各勝擅場，各有特色，故不應揚此抑彼。又如彭兆蓀在《荊石山房文序》中說：「有唐一代，斯體尤崇。穎達以之敘經，房喬用之論史，其於散著途異原同。」指出駢文的達意，可發揮散文暢所欲言的方用功能，同出一原，只是形式有異而已。

六、結 論

綜言之，中國駢文批評孕育於漢魏六朝、成型於隋唐五代、轉型於宋代、沉寂於元明二代、成熟於清代。駢文批評由漢魏六朝的觀念模糊，形成間接批評的特點，逐步走向駢散觀念的明晰，甚而兩者對立。及至宋代，進一步形成四六文話的格局，使駢文批評漸成系統，雖經元明二代的窒礙，但仍無阻於清代駢文批評的復興與繁榮。

註釋：

[1] 《駢文學》，張仁青著，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初版，頁91。

[2]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魏晉六朝文》，嚴可均輯，中華書局，1991年第五版，頁1091。

[3] 《曹植集校注》，曹植著，趙幼文校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初版，頁142。

[4] 同注[3]，頁1222-1223。

[5] 《文賦集釋》，陸機著，張少康集釋，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頁20。

[6] 同上，頁36。

[7] 同上，頁132。

[8] 同上，頁145。

[9] 同上，頁223。

[10] 同上，頁229。

[11] 同上，頁132。

[12] 同上，頁241。

[13] 《歐陽修全集》卷四十七。